



## 国防纪事

冬日的于都河，水波微澜，浮桥在风中轻摇。双帆造型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静静矗立，如同摊开的史册。我蹲在斑驳的石板上，掬起一捧河水，恍惚触到了那个夜晚的温度——800多条渔船连成生命线，门板、床板、店铺板、寿材铺就的通道上，8.6万名中央红军趁着黑夜渡河。

我家的两位亲人便在其中，裹着征衣望过最后一眼故土，背影融进河对岸的晨曦。

“爸，太爷爷他们为什么义无反顾地踏上长征路？”儿子的问话将我从恍惚中拉回。

“为了撕破沉沉暗夜。”我望着悠悠河水，“为了让后人能永远活在光里。”

—

1933年春，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如火如荼。我的爷爷肖尚伟，大爷爷肖尚喜，堂伯父肖思煜、肖思坊4人相约一起参加红军。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前线——广昌，他们用热血点燃了家族追光的第一簇火苗。

一次激战中，爷爷肖尚伟身负重伤，子弹贯穿腹部。伤未痊愈，他又返回战场，不幸再次中弹，左腿膝盖被击碎，失去行军作战的能力。

大年初一，爷爷在老家乡养好伤后，一拐一瘸地回到家。衣衫褴褛的他在家门口跟奶奶打招呼，奶奶竟然没认出来。

“我是法生！”当爷爷说出自己的小名时，奶奶惊呆了，顿时泪如雨下，赶忙上前把他扶进屋里。

战斗中，堂伯父肖思坊大腿内侧被子弹击中致残，遗憾地离开部队。

大爷爷肖尚喜和堂伯父肖思煜则跟随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，踏上漫漫长征路。他们不知道要走向哪里，也不知道征途有多远，更不知道此去便是永别。

太奶奶日夜守望，从春到冬，从青丝到白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等来的不是亲人的身影，而是薄薄的烈士证明书。太奶奶哭得死去活来，一病不起，不久便撒手人寰。大爷爷和堂伯父参加了什么战斗、牺牲在哪里、安葬在何方，家人一概不知。那两份烈士证明书，成了家族最珍贵也最沉重的传家宝。

二

红色家风的浸润，让参军报国的种

# 追光之路薪火传

■肖力民

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1991年冬，我参军入伍。1995年退役后，我被安置在江西省于都县入伍部，主要负责国防教育和新闻宣传工作。这或许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我得以读懂这片红土地的厚重历史——当年30余万人口的于都，有6.8万名青壮年参加红军、10万人拥军支前。几乎每家每户，都藏着一段与光同行的血色记忆。

采访中，每一位老红军的脸庞都让我倍感亲切。他们眼角的皱纹里，刻着亲人的身影。时光不等我，我争分夺秒地开展抢救性采访。对我而言，那些带着硝烟味的口述历史，每一次聆听都是心灵的震撼，每一滴泪水都饱含无限的崇敬。

2006年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，时任于都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尚贵从网上了解到，定居在湖南长沙的于都籍老红军张生荣有一个心愿，希望得到一把军号。张生荣是红一师特务连的司号长，嘹亮的军号声从未从老人的记忆里消失。起床号、休息号、吃饭号、冲锋号、疏散号、紧急集合号……老人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。最让老人引以为荣的是，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时，他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。为了圆老人的心愿，袁尚贵特地打电话给我，询问能否找到一把军号。后来，我们想方设法从民间收藏者手中买来一把军号。县里专门成立了“圆老红军心愿行动队”，千里迢迢赶赴长沙。

见到家乡来人，老红军张生荣难掩内心的激动和喜悦。当队员把军号递给张老时，他颤抖着双手接过，放在嘴边吹了起来。在场的人都没想到，时年87岁的老人吹出的号声那么嘹亮、那么有节奏、那么有激情。

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穿越时空的号声，仿佛让我看见自己的亲人跃出战场与敌人厮杀的身影。

三

于都县禾丰镇村民尹善祥家的墙壁上，一幅简笔画《我的红军太爷爷朱煊灿》，与尹善祥孙子尹志清的奖状并列在一起，静静诉说着90多年接力守护的故事。

1931年10月，红三军团进驻禾丰镇整编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建立苏维埃政权。红军与当地百姓亲如一家。时任五团机枪连连长朱煊灿，带着全连住在尹善祥的爷爷尹星阶家。红军在尹星阶的房子内外写满红军标语，共计180条。尹星阶是一位私塾先生，朱煊灿也是文化人，两人有共同语言，经常彻夜长谈，结下深厚的友谊。

两个月之后，红军队伍即将离开。

临行前的夜晚，朱煊灿与尹星阶相约，革命胜利后再相见。朱煊灿将一个小木箱送给尹星阶，内有一支钢笔、一个笔记本。小木箱长45.5厘米、宽13厘米、高10厘米，精致小巧。尹星阶觉得礼物太贵重，说什么也不肯收。朱煊灿告诉他：“这物品你用得上，就当是我们这段时间住在你家的一点心意吧。”

第二天，红军部队开拔，刚到禾丰与丰田交界，便与敌军发生遭遇战。朱煊灿身先士卒杀入敌阵，不幸中弹牺牲，年仅29岁。

噩耗传来，尹星阶无比悲痛。遵照朱煊灿的遗愿，红军战士将他的遗体抬至后山，军民一起将他安葬，没有立墓碑，也没有文字记载，只用3块大石头摆在坟墓上作为记号。

后来，尹星阶专门新增了两条家规：一是红军留下的标语、物品，是红军为穷人谋幸福的见证，非常珍贵，一定要保护好；二是每年清明节，子孙必须像对待自家的祖坟一样，给朱煊灿烈士扫墓。

2023年，朱煊灿烈士英勇杀敌、尹家90多年接力守护烈士墓的故事，经新闻媒体宣传后，感动了无数人。于都县相关部门专门组织人员现场查看朱煊灿烈士墓，制订修缮方案，专武干部、民兵、退役军人和尹氏族义务帮工。我们赶在清明节前，把烈士墓修缮一新。

四

红军独立三师师长刘铁超烈士后人于与都人民双向奔赴，一起寻找刘铁超烈士的故事令人动容。

刘铁超出生于湖南耒阳，毕业于黄埔军校，参加了北伐战争、湘南暴动。之后，跟随毛泽东同志到井冈山，转战赣南闽西，1932年在江西作战时牺牲。刘铁超避大路、择中径、堵截敌人的作战方略，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。

刘铁超牺牲前，给家里写了一封信，并附上一首诗：“自古英雄多宏志，血性男儿应图强。封侯拜相非吾愿，革命成功便还乡。几番梦见井上月，君牵儿女村前望。人间恩爱难相聚，缘为穷人求解放。”一位红军将领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铁超的亲人才得知他已牺牲。但他在哪里牺牲、在哪里安葬，家人一无所知。数十年来，刘铁超的后人苦苦寻找，一直未果。

2023年，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馆长丁良跃花了两个月时间，走访多地进行调查，并查阅大量的党史资料以及老红军访谈资料，最终确认刘铁超牺牲在该县葛坳乡杨梅村“土围子”战斗中，被安葬在“土围子”附近的

一个小山坡上。

1932年8月，刘铁超率部攻打“土围子”时，因久攻不下，便利用当地群众捐赠的铁桶制作成土炸弹，并挖通多条通往“土围子”的地道，将土炸弹埋到“土围子”的墙根下。敌人慌了手脚，拼命从墙内打洞灌水，使土炸弹受潮失效。土炸弹点燃后没有爆炸，刘铁超只身进入洞中一探究竟。不料这时，敌人子弹飞来，击中了他的心脏，刘铁超壮烈牺牲。

红军将士无比悲痛，发誓要打下“土围子”，为师长报仇雪恨。那几天连降暴雨，河水上涨。他们利用水淹“土围子”的办法，在“土围子”下游隘口的窄处筑起河坝。“土围子”被淹没，一片汪洋，敌军一片慌乱，纷纷出逃。红军趁势发起进攻，敌首被当场击毙。

得知刘铁超的牺牲地、安葬地，烈士后人倍感欣慰，千里迢迢前来祭奠。为表达感恩之心，他们向杨梅小学捐赠8台电脑。

新修缮的刘铁超烈士墓，成为葛坳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。如今，当地又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刘铁超烈士陈列馆的建设工作。

刘铁超烈士的曾孙女刘晓蓉动情地对我说：“感恩于都人民炙热的红色情怀。太爷爷的革命精神，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。”

五

“要继续寻找你的大爷爷、堂伯父。”2015年，父亲临终前的嘱托，成了我心中沉甸甸的使命。二伯父90岁高龄，也曾多次向我提起寻找祖辈的事。多年来，我循着先辈足迹，走遍了原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，虽未如愿，却在寻访中愈发读懂了先辈。

2022年4月，我加入了以红军后代为主体的公益性社会团体——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，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，追寻亲人的机会也更多了。2024年7月底，我陪同袁尚贵去河北石家庄宣讲长征文化时，特地走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。在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戚欣的帮助下，我们寻找到并进一步补充完善了邓典龙、钟奇、杨承德3位于都籍烈士的相关资料。

最让我欣慰的是，儿子也踏上了追光之路。今年3月，他穿上了军装。在部队，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宣讲，并走上部队讲台，深情讲述自己祖辈和于都河畔的故事，感动了很多战友。

于都这片土地，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。追光之路，永无止境。我们将循着先辈的足迹，继续擎起闪亮的精神火炬，追寻光、守护光，成为光、散发光。

# 青春诗行

■蒋德红



## 军旅点滴

18岁那年，我离家参军。火车一路向北，窗外的景色从满目苍翠渐渐变成银装素裹。到站停车时，新兵班长已在站台等候，脸上带着微笑。

抵达营区后，班长带我们走进食堂。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，成了我军生涯温暖的开端。

“你们要记住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”当天的班务会上，班长的话简短有力，字字刻在我们心头。那时的我，只知道记住这句话，并不懂其中沉甸甸的分量。直到一周后的木马训练，让我初次领略这句话背后的深意。

童年时骑牛摔落的阴影，让我对跨越有着本能的恐惧。面对一米多高、一米多长的木马，我心里全是跳不过去的怯懦，怕骑在木马上出丑，更怕一头栽倒在地。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助跑、腾空、跃过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我的心跳如擂鼓，手心满是冷汗。班长一次次给我示范，耐心讲解动作要领，可每次我鼓起勇气助跑，到了木马跟前，双脚会不受控制地“急刹车”。

“你到底能不能跳？”班长的问话里透出焦急。

“班长，让我再准备准备。”我的回答没有底气。

“训练场就是战场，没有时间给你准备。”班长的声音陡然提高，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急切。

我不敢动，眼睁睁看着其他战友整队带回，操场上只剩下班长和我。寒风刮过脸颊，带着刺骨的凉意，我心里有些憋屈。班长的语气缓和下来，鼓励我说：“别灰心，相信自己。再试一次吧，我会

在旁边助推你一把。”

看着他笃定的眼神，我再次鼓起勇气。助跑、蹬地、腾空，双手下意识地扶住木马，身体竟轻盈地跃了过去。落地的那一刻，我回头望去，班长就站在原地，根本没有伸手。原来，他是用这种方式激励我战胜自己。

我明白了，军人的世界里，没有“准备好”的完美时机，命令下达的瞬间，就是必须义无反顾行动的时刻。即使双腿颤抖，也要勇敢地冲向前。

1998年夏天，部队奉命奔赴嫩江流域抗洪抢险。到达白沙滩时，眼前的景象令人心头一沉：这里是一座小型水电站，沙地松散，随时有溃堤的危险。洪水水位已高过坝下的村庄，巨浪接连撞击着堤坝，水花不时翻过坝顶，打在我们身上。

“务必在第二次洪峰到来之前，在原有堤坝基础上再筑高一米！”连长的命令掷地有声。我们分工协作，挖土、装袋、传递，一个个麻袋堆向堤坝。傍晚时分，任务完成，我们累得几乎虚脱。

还未来得及休整，又接到命令：“第二次洪峰将于晚上9点左右通过，务必死守阵地。”夜空突然狂风大作，玉米般大小的雨点砸在地上。我们迅速分头整理装备器材。

“带上背包绳，立即集合！”连长的命令声穿透风雨。我们将背包绳系在腰上，在泥泞的堤坝上艰难前行。

“渗水了！”巡堤战友的呼喊声从雨中传来。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——渗水是堤坝的克星，若不及时封堵，随时可能引发管涌，导致决堤。

“全营集合，扛土堵涌！”营长下令。几百名战友的呼号声盖过雨声，整齐列队在堤坝上。

“党员下水堵漏点，其余人员装土，

从30米外往上堆！”没有激昂的动员，营长直接安排分工。

作为预备党员的我，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，毫不犹豫地加入党员队伍。我们把背包绳的一端交给堤坝上的战友，依次跳进汹涌的洪水。浪花一次次将我推向堤坝，又将我拉回江中。起初，我们将装满土的麻袋堆到洞口，可风浪太大，麻袋刚投下去就被冲走，毫无效果。

关键时刻，排长喊道：“党员手拉手，围成半圆挡住浪！”我们紧紧拉住彼此的手，在洞口外侧筑起一道人墙。其他战友趁机将麻袋塞进洞口，我们再用身体抵住压实。

洪峰安然过境，我们回头望去，那些用来封堵漏点的麻袋堆成了小山。沾满泥浆的军装紧贴在身上，手脚泡得发白。那一刻，我真正读懂了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”的含义——命令下达时，没有时间犹豫，没有余地退缩，唯有挺身而出。而这份果敢与坚决，源于日复一日的训练与准备。

2003年8月，部队接到转隶命令，将赴边防执行戍边任务。消息传来，战友们纷纷向组织递交申请书、请战书。一位休假的战友孩子还没满月，接到通知后，简单安顿好家人，立刻归队；一位战友的父亲瘫痪在床多年，母亲刚做完手术，可他找到领导撤回转业申请，在转隶申请书上写道：“家庭虽有困难，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只要组织需要，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。”

打起背包赴边关。转隶那天，部队整齐列队，呼号声震天动地。部队分散驻守边防线上，条件远比想象中艰苦：有的哨所方圆百里无人烟，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；有的哨所暂时租住民房，战友们没有抱怨，一边抓紧时间训

练执勤，一边动手营建家园——平整场地、搭建温室、修缮营房，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一笔一画镌刻在边防线上。

八号闸哨所辖区的33号界碑在峡谷深处，战友们要先乘车再徒步，穿过一片泥泞草地，依靠攀登绳下100多米高的陡坡，最后穿过密林才能到达。

有一次，班长谢法辉带队执行巡逻任务。走到陡坡位置，突然下起暴雪，大家依次顺着攀登绳向下挪动。战士向利体力不支，手未握紧，身体突然下坠。

“向利注意，握紧攀登绳！”危急时刻，谢法辉不顾自身安危，立即拉紧攀登绳，快速下降营救，向利毫发未伤。

谷底比山上温度更低，寒风如刀，大家的手脚渐渐失去知觉。穿过密林抵达界碑时，望着界碑上鲜红的国徽和“中国”二字，所有的疲惫瞬间消散，他们用冻得发紫的手敬了标准的军礼。

边防军人没有平时和战时之分。执勤就是战斗，上哨就是上战场。

2023年初，八号闸哨所接到通报，有不法分子潜入辖区，存在越境风险。正值隆冬，大雪封山。“按脚印追踪！”排长当机立断。5分钟后，他们带着干粮和装备出发了。不法分子的脚印在积雪中延伸，一直通向密林深处，战友们徒步追踪。寒风像野兽一样嘶吼，雪片打在脸上，让人睁不开眼。没有人停下休息，反而加快了步伐，因为风雪一旦掩盖脚印，任务将无法完成。

傍晚时分，经过近10个小时的艰难跋涉，他们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抓获不法分子……

如今，我已服役近30年的老兵，依然坚守在边防线上。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战士来到这里，接力戍守这片土地。他们眼神清澈，身姿挺拔、蓬勃向上，用忠诚在边防线上书写青春诗行。



## 红色记忆

历史的年轮镌刻九秩沧桑，北京西郊樱桃沟的晨光穿透层层叠叠的松林，为巨石上“保卫华北”4个红色大字镀上熠熠华彩。历经风霜侵蚀，遒劲的字迹依旧如当年青年学生的呐喊一般振聋发聩。这块“爱国石”，与寿安山、香山怀抱间的3座白色三角亭相映成景，匠心设计蕴藏一二·九运动的历史密码，在苍松翠柏掩映下，诉说着学子投笔从戎、共赴国难的峥嵘往事。

“华北之大，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！”1935年12月9日，这句振聋发聩的呐喊划破北平的夜空。彼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步步紧逼，通过《何梅协定》妄图吞并华北，中华民族危在旦夕。在中国共产党号召、组织与引领下，北平大中学生冲破重重封锁，高举“反对华北自治”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的标语旗帜，在军警的大刀、棍棒下奋勇抗争，以血肉之躯践行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誓言。12月16日，学生再次集结游行，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，抗日救亡火种迅速燃遍长城内外。

游行唤醒了民众，更让青年学子深知，唯有将知识转化为战斗力，才能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。在中共北平市委及地下组织的秘密领导和支持下，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（简称“北平学联”）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选址西山樱桃沟举办军事训练营——这里山深林密便于隐蔽，地形复杂适合演练，更能锤炼青年学子的协作意识与纪律观念。1936年暑期，第一期军事训练营开营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东北大学等高校的170余名进步学子，告别象牙塔开启“铸剑之旅”。

黎明破晓，爬山、长跑、队列操练风雨无阻；烈日当空，劈刺训练呐喊震谷，木枪突刺格挡虎虎生风；射击训练，凝神瞄准，锤炼本领；工事构筑，一铲一锹皆是筑牢防御阵地的实践。山林间，高校学子们深入研习游击战术，进行攻防对抗、毒气防护、空袭疏散等实战训练，迅速褪去稚气，增长胆识。其间，宋明、袁也烈等红军教官亲临授课，将井冈山斗争的体会、苏区游击战术精髓倾囊相授，不断丰富学子们的军事斗争经验。

军事训练强筋骨，政治铸魂明方向。樱桃沟元宝石下，杨秀峰、黄松龄等教授结合革命战争实践与青年学生特点，剖析抗战形势，帮助大家认清时局；《中国苏维埃政府、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（即八一宣言）等文件在学子中间传阅，“抗日救国之路”大讨论有力凝聚了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的共识。曾任东北义勇军将领的白乙化含泪讲述沦陷之痛，更加坚定了学子们“宁死不当亡国奴”的决心；红军干部分享苏区斗

# 红色樱桃沟

■夏启

争历程，生动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。营地里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旋律响彻山谷，学子自编活报剧讽刺汉奸、讴歌英雄，集体生活与时事辩论深深熔铸了他们的家国情怀与革命气节。学子们在山石上刻下“保卫华北”“收复失地”，以表达抗战心声。

截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军事训练营共举办3期，培养数百名抗日骨干。其中许多人或投身八路军、新四军，在平型关大捷、百团大战中冲锋陷阵；或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，让抗日火种燃遍祖国山河，用热血与生命践行“保卫华北、保卫中国”的誓言。

樱桃沟这片隐秘的山林，见证了北平进步青年学生放下笔杆、拿起枪杆，从书斋走向战场的蜕变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：“一二·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，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，准备了抗战的人心，准备了抗战的干部。”

1985年，樱桃沟建起一二·九运动纪念馆。3座三角亭以当年军事训练营所用露营帐篷为原型，组成一个立体的“众”字，象征众志成城抵抗侵略。

回望烽火岁月，樱桃沟的历史足音仍在耳畔回响，青年学子的呐喊仍在心头激荡。90年前，北平学子以青春为炬，照亮民族救亡的漫漫长夜；90年后，新时代青年以理想为帆，续写强国强军的时代华章。从樱桃沟的军事训练营到如今的校园军训，从当年的投笔从戎到如今的携笔从戎，不变的是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家国情怀，是“强国有我，强军有我”的责任担当。



天高云淡（中国画）

周新光作